

奧斯德
許無愁

著
譯

基督與共產主義

基督與共產主義

廣學會出版

作者原序

我已經讀了許多關於蘇俄實驗共產主義的書籍，其理由有二。第一，我覺得東方西方，都受了鞭策，受到一種新理論新目的、新制度之鞭策。這很使我耿耿不忘，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相當的應付。一個人知道有重大艱難不適之工作，近在目前，必得着手進行之際，而同時又有各種不關重要之事物，以延宕之；這樣，他的心志，就不安了，因為他知道早晚必得應付這較大的事物。他雖傾心於不關重要之細事末節，然仍不能使他忘懷於未圖之大業。基督教界的明哲，知道他們遲早必須解決在蘇俄馬克斯主義實驗中所引起之問題。然解決此種問題，並非神學上的辯論（假若神學包括這些問題的話，則我們早在爭鬭狀態中了），而是新式世界制度之實施。這個困擾的問題，由此而發生猶豫了。我們誦讀贊成與反對共產主義之宣傳，希望由此而獲得問題之解

決。但是並沒有解決。我們由於爭論當中，看到新制度產生之事實。此種制度，對於現代文明之整個基礎，迥不相牟，而頗具挑戰之意味。

姑無論滿布此種爭論之空氣，吾人可知蘇俄人民，正表顯其驚人之進步。例如識字之人數，一九一三年儘佔全俄人數百分之三五；及至今日，已達百分之八五了。一九一二年，僅有學童三、五〇〇、〇〇〇人；今日中小學生之總數，已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了。日報之流通，較諸俄皇時代，已增十二倍。工業生產之地位，已由第八位而升入世界第二個國家了。在工業之總生產量上，只有美國超過他們。而他們就豫備在五年之內、達到美國總生產量之目的。蘇維埃生產量之總額，除農業生產而外，較諸一九一四年，已經增加三三四倍了。他們正在莫斯科建築世界最高大最顯赫之華廈，以充國會與列寧紀念館。他們豫期在物質上與文化上之成就，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而此種事實，可為象徵說，且一切宗教，都沒有用了。俄國將非宗教與物質文化之成就，聯成一

貫，就使我們覺悟到，基督教國家對於蘇俄所應付的問題，尙未着手應付呢。基督教界對此頗感不安。因爲它知道，姑無論肆意於一切不重要之事物，遲早必須以充分之答案，去應付這個問題。且所謂充分的答案，非充分之辯論，而爲較良制度之產生。此種策勵，在基督教國家方面，實爲真實刺痛之策勵。

我要誦讀關於蘇俄一切書籍的第二個理由，是在我回印度去的路上，要自己去看一看共產主義的究竟，希望可以直接了解這種偉大試驗的情形和傾向。

但是我讀了一切的書籍之後，覺得內容並不完全，還有未盡的話呢。許多由於基督教立場所著成的書，善辯鋒利而動人，讓我們看到蘇俄的情形，並且感動讀者，做出積極的事業來。但是論到基督教的方法上，都好像不很有力，或是猶豫不決的樣子。這許多書籍，都好像以爲我們已經知道基督教的方法，就毋容細說似的。但是那樣的論述，就不很明白的了。

我在一方面感覺到蘇俄的策勵，而在另一方面，又感覺到一種較大的策勵——那就是某種龐大的勢不可當而具有挑戰意味的東西，那就是天國。基督教的著述家，已經明白天國和天國的解釋。但是在他們的解釋當中，對於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並沒有指出一個首當其衝的囊括一切的答案來。有一天晚上，我在海船上坐着看書，內在的呼聲，對我提出這個問題來，說我應否去作成那樣的解釋。此種呼聲，較諸筆墨所能形容的，更為強烈。這是一種任務，這幾乎是一個不得不然的使命。

我把這個工作，攔了許多禮拜，因為馬克斯主義所發生的問題，包括社會與經濟之專門事項，不在我所解釋的範圍之內。我是向東方宣傳基督的，必須以解釋基督為任務，後來更加知道，以解釋基督福音去應付共產主義，也是我的任務。

所幸我從蘇俄回到喜馬拉亞山之薩特塔耳，在那裏召集了一個百數人的討論會，共同研究基督教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約有兩月之久，使我在這本書裏，得到許多團

體的糾正和感想。我們從那兩個月的集體研究當中，產生了火熱的心意。知道在我們前面有一條出路，就是地上的天國。我們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答案。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充分的答案。

但是在天國當中，雖有一個充分的答案，而我們對於那個答案的解釋，或許是偏面的，不完全的。我們希望這種解釋，至少要指出一條可以前進的路來。本書之成，尚係粗糙、若蒙勤奮學者，潤飾指正，則不勝感激之至。在基督教的方法上，能得到充分明白的結果以前，我們需要有一個實行家與思想家的集團，各自貢獻其思想與計劃。現在這個基督教的方法，正在醞釀中，但是我們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乘世人正在決定方針的時候，我們必須預備一個充分的計劃。

我用耶穌在拿撒勒會堂裏所宣布的，作為計劃的起點，但那只不過是起點而已。我相信我不會把耶穌的這個宣布，重視太過，若讀者以為我太偏重於這一端的話，則我却

並不專以這個宣布作根據，而是以新約全部的精神與教訓爲立場的。這是我在心裏所存着的正當的理由。

我寫這篇序言的地方，正位於印度地理上之中心。在那個禮拜天的早晨，我的同事來叫我，說莫斯科正用英語播送演講，我必須去聽。我聽到演講結束之後，議員又對無線電聽衆宣布，謂下列問題，寄入最好之答案者有獎云云：第一，爲什麼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內，沒有失業？第二，在蘇維埃的制度之下，有否個人的自由？

在這個古代的印度當中，禮拜天的清晨，本來充滿着寂寞平靜的空氣，現在却侵入那兩個問題來了。沒有失業嗎？在這個鬧着失業恐慌的世界當中，竟有一個沒有失業的地方嗎？這必須有一種惹人注意的地方。但不論是否有惹人注意之所在，蘇俄實驗共產主義的整個問題，已經侵入冷靜寂寞的東方和戮力奮鬥的西方來了。假若有任何基督教答案的話，則這種答案，必須清晰無誤纔行。

龔斯德序於印度雷俄那特神學院

基督與共產主義目錄

作者原序.....	一六
引 論 未來的危機——基督教的選擇.....	一
第一章 對於經濟權被剝奪者的福音（上）.....	三六
第二章 對於經濟權被剝奪者的福音（下）.....	六八
第三章 對於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福音（上）.....	九九
第四章 對於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福音（下）.....	一二七
第五章 對於殘廢病人的福音.....	一五六
第六章 對於道德和靈性墮落者的福音.....	一七五
第七章 一個全世界普遍的新開始.....	一九五

第八章	促進天國的原動力	二一八
第九章	誰在地上產生天國呢？	二五九
第十章	基督會忍受壓迫嗎？	二九八
第十一章	此後的步驟	三五〇——三九九

基督與共產主義

引論 未來的危機——基督教的選擇

基督教已經臨到重要的危機，也許就是一個決定生死關頭的危機了。歷史事實之演變，正到了世界最後的決斷；在這個時代，或最遲到下一個時代，究竟採取唯物的無神的共產主義，抑或選擇「地上的天國」，不論東方西方，都不得不有一個切實的定當。

社會的基礎，正在我們眼前動搖，許多舊日的保障，業已失却，或正繼續消失。我遊歷世界各國，總看到人們起了異常的感覺，彷彿像歐戰期間與登堡線擊破的時候，德國人所感覺到的情緒一般。當那條防線未破的時候，他們是覺得安全的；既破之後，他們就恐慌起來了。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的時期，舊日的防綫，已經衝破，將來的許多疑問，就困擾了我們。這條防綫之所以墮壞的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為現代的智識，在生

活上打破了區域的思想，給與我們一個世界聯合的觀念，而人類實際生活之機構，又嫌範圍太窄，不足以適合這個統一的觀念。有一位有力的思想家培克耳（A. G. Baker）診斷我們的困難說：「二十世紀所遇到的主要困難，就是千百萬人類，本為特殊文化區域的產物，忽然很迅速地推廣其生活的環境，到於全世界，產生國際間非常複雜的關係，用以調整社會的大多數思想和習慣，都成為不合時宜的遺傳物了。例如目前的政治組織，本來是為適應各地方的情形而產生的，現在要以殖民行政，勢力均衡，國家主權等方法，盡力來解決國際間的問題，則對於全世界的要求，自然扞格不行了。正如英國古代的憲章和美國十三州的海濱殖民心理，不能適合現代北美合衆國廣漠的領土行政一樣。

假若這個診斷是不錯的話，則我們認為我們的基本困難點，較諸上面所舉的例子，還要深沉，因為目前主要的根本的困難，不在政治而在經濟與社會，特別是經濟組織的

失當。我們在政治上的大多數困難，其病象多本於經濟結構之不良。我們要力謀世界之合作與統一，而現代經濟生活之基礎，却在競爭，且正事分化，此爲世界主要之病態，亦爲敗壞世界局勢之事實。就是我們對於日常生計的奮鬥，亦莫不基於自私與刻薄之競爭。當然，因爲許多仁愛的事業，此種競爭的局面，往往稍趨於和緩，競爭是最堅決最刺激最興奮的一種心理，從個人的行爲，直至國內與國際的政治行動，無不運用自私競爭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世界混亂的根源。例如我和西門爵士 (Sir John Simon) 坐了一個講臺上，我聽他講到日內瓦的軍縮會議，以各國外交家摯懇之努力，謀裁減各國之軍備，而結果毫無，全歸失敗。但是我們一望而知其困難之所在了：在這個基於競爭的世界裏面，你怎樣可教各國裁減軍備呢？這是他們生存的武器，豈能棄而不用嗎？若國家的生存果基於競爭，則此種武器，當爲自然之設備。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達到人類發展的地步，知道一切反時代的觀念當中，尤以自私的

競爭，最爲違反時代，而不足以適合這個正在努力產生的新世界。假若我們將來的新世界，不能以合作爲基礎，則人類必歸於消滅，因建設新世界，固有甚多之條件，然合作精神，必當爲其中心之條件。蓋吾人若以自私之手段，拯救生命，必失却之；若爲公衆之利益，失去生命，必復得之，此爲天下萬事之本性，我們可採取之，或放棄之，其對於未來之成全或破壞，關係重大，亦爲創造未來之基本原則。我承認低級的自然界裏面，對於這一點，不很清楚，因爲競爭的法則，還是運行各處。但是在我們所努力產生的高等的社會制度裏面，總以合作爲生命之原則，必以「互助」代替「自我排斥他我」的現象。

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也能適合未來的合作組織嗎？若是能夠適合的話，那我就最愉快也沒有了，因爲我不喜歡有什麼變革，以致發生種種的顛覆；我也不願牽涉到任何經濟計劃之變更。但是我怕資本主義社會之能適合合作組織，機會太少了。岐尼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然而他也說：「現代的資本主義，是極端非宗教的；牠的內部，毫不統一，也沒有公同的精神，僅爲凌亂渙散的一個財富所有者與追求者之集團（雖不常常如此）而已。」是故現代的資本主義，正事衡量，而感不足，根本不足以適應世界之需求。所謂世界之需求，就是對於一切人類要有充分的生產，要有充分的分配，並且同時要產生一個友愛的世界。資本主義憑其自身之貪得精神，頗足以生產，即馬克斯與恩格斯，亦承認此種生產之能力，惟不足以事分配，蓋公平與充分之分配，有妨資本主義之本質，且需要某種動機，而資本主義永付闕如也。伍德 (Wood) 說：「若國家收益之分配不均，即爲災難之全部，則資本家即宜善自擘劃，以免除之。」他說這樣的話，似乎很是爽直。然而那種災難，是根本的。當我們竭力要從溝壑裏掙扎出來，而沉重的磨石，却壓住了我們的頸項，不論有多少個人的善意，終不足以挽救這個根本的災難了。

社會的整個基礎，必須變競爭爲合作。陶遜 (C. H. Dawson) 說：「對於社會制度，不是個人的人文主義與某種集體主義之選擇，而是純粹機械觀的集體主義與精神觀的集體主義之選擇。」他說得很對。換言之，社會制度，當爲唯物的無神的共產主義與地上的天國二者之選擇。

我把選擇的範圍，縮小到這兩種，因我認爲法西斯主義不能算是永久的問題。牠的內部，有其自行崩墮的因素。他是要用武力來維持舊制度的一種東西。雖然對於現實的制度，也有稍加以變更的，但是主要的性質，還是一樣。牠使舊日的競爭精神，更加緊張，更加自私，更加刻薄，好像是有力的樣子。他一時成功了，然而這是一種國家的熱症，不是國家的力量。熱症之後，必趨頹喪。是故法西斯主義，不過是一種行不通的制度，正在末日之前，作曇花之一現罷了。

但是蘇俄所行的物觀共產主義，倒是一個社會的問題——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我

們可以根據牠的缺乏自由，牠的強制脅迫，牠的刻薄殘忍，牠的唯物史觀與無神論，而反對牠。然而牠也根據較高的原則，創設社會。就是合作的社會。那種合作，或許只限於共產主義信徒，和蘇維埃統治下的順民罷了。但是在這個制限之下，合作事業很有生氣，對於人民，都是一律平等的。斯大林向俄國的人民說：「國民！我們已經把『財富』這個名詞，藏在蘇聯的國家文庫裏了。」他對於我們資本主義國家的批評，可謂對症合藥。他所說的，不是指點集產制的財富，因為俄國的人民，正竭力要把牠增加，也正得到了驚人的成功。他所說的，是指點自私圖財的目的，是少數人得到財富而趨多數人於貧困的制度。我們在共產主義理想之下，或許感到跼促不安，或許恨惡牠，厭棄牠，但是我們終必受牠的非難，因為共產主義有一種較為高尚的理想。

只是當這種較高的理想，產生物質財富，提高蘇俄的生活程度，超過其他實行競爭制度的各國時，纔引起我們大多數的注意了。現在蘇俄的物質生活程度，固不及歐美多